双周 学术

戏曲研究的进展与转型

傅 谨

戏曲有悠久历史与深厚积淀，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特色，戏曲的繁荣发展对建设文化强国具有突出意义。而戏曲的滋生、成熟和发展，始终与戏曲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戏曲创作演出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21世纪以来国家对戏曲事业的重视程度更是急剧提升。戏曲的社会地位、发展态势和戏曲研究的互动，始终是我们思考与总结戏曲研究规律的重要角度。

戏曲进入文人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元杂剧被经典化的明初就开始了，直到民国初年，曲律都是早期严肃戏曲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曲律的高度关注，是由于最初的文人学者对戏曲的关注，集中于以套曲为主体的杂剧、传奇的规范化写作。尽管从明中叶开始戏曲表演逐渐进入文人视野，对戏曲文本的戏剧学意义的探讨和表演艺术研究，仍很少有人关注。王国维1912年成书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戏曲历史纵向与宏观的整体研究，该书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宋元戏曲史》，更说明戏曲真正成为文史研究的对象之一。戏曲小说等向来被视为小道，而王国维的史著正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视戏曲小说等文艺类型为值得为之治“史”的重要精神活动，体现了全新的文化认知。戏曲自此进入文人学者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更从文人化的昆曲写作，下沉至京剧等通俗演艺活动，及至其中的伶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在政府机构中专设戏曲改进局，进而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戏曲史研究和古代戏曲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在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者的努力下更为深入，尤其是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宋元南戏研究，大幅度拓宽了戏曲研究的视野。中国戏曲研究院则拥有特殊的行业优势，因其与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密切关联，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切入当代戏曲创作演出的研究，不仅改变了有史以来戏曲研究侧重文人创作的戏剧文本、疏于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的取向，更对戏曲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发挥了理论引导实践的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撰的《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戏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献整理成果。中央戏剧学院周贻白的个人著作《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长编》和中国戏曲研究院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是戏曲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前者是周贻白先生毕生研究中国戏曲的结晶，后者浓缩了戏曲研究院众多研究者的集体智慧，而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案头与场上相结合，在王国维之后，终于彻底把戏曲研究者的眼光从书斋里拉了出来，充分显示了戏曲千百年来作为中国各阶层最重要的舞台艺术欣赏对象这一特点，使戏曲研究真正成了活的学问。

改革开放之后，戏曲研究逐渐摆脱了非学术的桎梏，但戏曲在大学文科的教学研究体系里却被迅速边缘化。20世纪80–90年代，文化部门所属的戏曲研究专门机构通过《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大型志书的编撰，一度对全国各地戏曲研究人才的聚焦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遗憾的是，这些大型集成志书项目完成后，兼之戏曲演出市场的滑坡，各地戏曲研究机构纷纷衰落。

戏曲研究的边缘化现象，到新世纪出现有所缓和的景象，一方面是由于艺术学科在高等教育领域迅速扩张的大趋势中急速膨胀，戏剧与影视学科亦随之扩充。尽管在这一学科内部，从文学分化出来的影视和话剧学科门槛较不明显，因而相对发展较快，但戏曲却由于研究拓展的空间更大而颇受青睐，高等教育领域内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及成果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戏曲，也更易于引起学者关注。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恰逢其时推出，更激发了戏曲史论研究。因此，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原因，是外部人文环境的改善，但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的文化和学术自觉，也是内在的原因。

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出明显的转型趋势。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苏俄戏剧理论，对20世纪50年代的戏曲研究构成最显著的影响，那么，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就是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面貌出现转型的新的理论背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理念勃兴，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反映，就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引入。几乎从戏曲研究的现代形态出现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本民族的艺术类型视为“他者”的，基于欧美和苏俄的戏剧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观念）阐释戏曲的规律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戏曲历史与现实真相的揭示，也很难充分体现戏曲剧种的多样化面貌。21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在努力摆脱西方戏剧理论的遮蔽，因之有更多从戏曲本体出发的研究与阐释，无论史论的取向，还是戏曲舞台实践的阐释，都因之发生了重要变化。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启发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贴身当下的戏曲实际，戏曲田野调查与研究，还有各类口述史，都成为重要的学术方法与路径。京剧及梅兰芳研究、昆曲研究在戏曲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或有一定的偶然性，如中国戏曲学院开创性地将“京剧学”作为研究重心及昆曲的世界“非遗”身份等，但戏曲有数以百计的地方剧种，文化多样性理念对各地方剧种的研究更具方法论价值，剧种尤其是小剧种的研究成为近年戏曲领域成果数量最具爆发性的增长点，却绝非出于偶然。

戏曲研究从观念先行的和社会学导向的研究，转向更切近于戏曲本体的实学的研究，这一取向与21世纪以来戏曲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停滞多年后，说戏曲类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在新世纪进入喷发期，一点也不为过。《全元曲》《全明曲》编撰完成和《全清曲》编撰工作的推进，《古本戏曲丛刊》多年中断后又得以持续，多个域外大型图书馆所藏的戏曲文献被发现和发掘。戏曲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理解和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各类电子数据库的出现，其中“晚清民国期刊全文资料库”和《申报》数字化几乎取代了古籍，成为戏曲学者们利用率最高的文献类型；而《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和民国卷的整理出版，各类包括工尺谱和身段谱的演出本、晚清民国年间的戏单、报刊广告与评论等资料汇编相继面世，明显拓宽了文献的范围，让戏曲研究者有更多的可能性，从此前偏于关注古代戏曲经典（及其作为韵文的曲律）的文学研究，向现当代戏曲研究延伸，更扩展至包括戏曲表演在内的更具综合性的演艺研究，体现了对戏曲艺术本体和文化意义的新认知。大量戏曲类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既说明学界越来越重视戏曲研究，同时又是推动戏曲研究发展直接的动力，当然也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让戏曲类图书尤其是大型文献资料类图书的整理出版，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支持。

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理应把握新的机遇，不断追求新的突破。戏曲界还有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有待整理，古代戏曲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戏曲艺术规律的深度把握，在此基础上更努力开展贴近当代戏曲现实的理论评论，都将有助于更完整全面地阐释中华美学，重建文化自信，推动戏曲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

家训 品鉴⑥

《朱柏庐治家格言》：治家之经

王 杰

《朱柏庐治家格言》又名《朱子家训》，是一部以家庭道德教育为主的启蒙教材。它精辟地阐明了一个家庭中修身治家之道，被誉为“治家之经”。

朱柏庐（1627—1698）原名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少年时读书不辍，曾考取秀才，醉心于仕途。明朝灭亡后，便无心再求取功名，于是隐居家乡，以教授学生为业。他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能做到严以律己、宠辱不惊，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等，不卑不亢，以礼自持。他与同乡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后又多次拒绝地方官举荐的乡饮大宾，与徐枋、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所著《治家格言》是其代表作，全文634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

《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内容如下：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大致意思就是：

每天早晨黎明就要起床，先用水来洒湿庭堂内外的地面，然后扫地，使庭堂内外干净整洁；黄昏来临，就要休息，并亲自检查一下要关锁的门户。对于一顿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家僮、奴仆，不可雇用英俊美貌的，妻、妾千万不可有艳丽的妆饰。

祖宗虽然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祭祀时却仍然要虔诚专心；子孙即使不谙世事，教育也是不容怠慢敷衍的。自己生活节俭，以做人的正道来教育子孙。不要贪婪原本就不属于你的财富，也不要喝过量的酒。和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们交易，不要占他们的便宜，看到穷苦的亲戚或邻居，要关心他们，并且要给予他们财物或其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人刻薄而发家的，绝对是不可能长久的。为人处事违背伦常的人，也不可能立足于社会。兄弟叔侄之间要互相帮助，富有的要资助贫穷的；一个家庭要有严正的规矩，长辈对晚辈，说话时言辞应庄重。听信妇人挑拨离间，而伤了骨肉之情，哪里配做一个大丈夫？看重钱财，而慢待父母，就没有资格为人子女。嫁女儿，要为她选择贤良的夫婿，不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娶媳妇，要娶那些贤淑端庄的女子，不要贪图丰厚的嫁妆。看到富贵的人，便做出巴结讨好的样子，是最可耻的；遇着贫穷的人，便做出骄横无礼的态度，是最鄙贱的。

居家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尽量避免争斗诉讼，一旦争斗诉讼，无论胜败输赢，结果都是不好的。处世不可多说话，言多必失。不可用势力来欺凌压迫孤儿寡女，不要贪图口腹之欲，而任意宰杀牛羊鸡鸭等动物。性格古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人，常常会因为做错事而感到懊悔不已；颓废懒惰，沉溺不悟，是难以成家立业的。亲近不良的少年，日子久了，必然会受到牵累；恭敬自谦，虚心地与那些阅历多而善于处事的人交往，一旦遇到急难的时候，就可以受到他的指导或帮助。对那些善于说长道短、嚼舌之人，不可轻信他们的话，要多加思考提防。如果事情起争执，要冷静地反躬自省，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对人施了恩惠，不要老记在心里；受了他人的恩惠，一定要常记在心。无论做什么事，要留有余地，要学会知足，知足才会常乐。他人有了喜庆的事情，不可有妒忌之心；他人有了祸患，不可有幸灾乐祸之心。做了好事，而想让他人看见或知道，就不是真正的善人；做了坏事，而怕他人知道，就是真正的恶人。看到美貌的女性而起邪心的，将来会在自己的妻子儿女身上得到报应；怀怨恨之心而暗中伤害他人的，将来会在自己的子孙那里留下祸根。家里和气平安，虽缺衣少食，也会觉得快乐；尽快缴完赋税，即使口袋所剩无几，也会自得其乐。读圣贤书，目的在学圣贤的行为，不只是为了科举及第；做一个官吏，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怎么可以只考虑自己和家人的享受？我们守住本分，努力工作生活，上天自有安排。如果能够这样做人，那就差不多和圣贤做人的道理相同了。

《治家格言》的宗旨是儒家思想的宗旨，这个宗旨就是修身齐家，主要告诫家人要勤俭持家，尊敬师长，和睦邻里，做好人、行好事。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勤俭持家、周密谋划等，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迷信报应、自得守旧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630余字，却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政协委员学党史

红船映初心 奋进新时代

——党史初学学习心得

黑德昆

4月的北京，正是满城烟柳、飞絮蒙空的时节。上下班路过北海，于春风沉醉间，从湖面逶迤穿梭的游舫上，想到嘉兴南湖上的那一条红船，想到那岁月深处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移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继续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学史明理

在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一群心怀天地的年轻人，在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饱受屈辱，寻求出路又屡屡碰壁的绝境中挺身而出，用年轻的肩膀扛起历史的重担，用青春热情点亮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带领中华民族踏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100年前的那艘红船，是沉沉黑夜中的曙光初现，是开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起点。100年来，这艘红船穿过风雨，驶过黑暗，指引中华民族驶向光明，驶向伟大复兴的航程。

嘉兴红船，是铸在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便将“红船精神”归结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他指出：“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在世界执政史上，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率领古老大国重新焕发生机，应对挑战、化解危机、创造奇迹的政党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奋力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崇高使命。

学史增信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前往南湖学习党史、瞻仰前贤，置身那里，仿佛在触摸历史，感受革命先驱在历史动荡中弄潮前行的激情，感受那庄严而艰辛的开始。百年前的乱世中，一群赤心为民的人，在暗夜中苦苦探寻，为一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国家谋求生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信仰信念信心照亮奋斗之路。

前贤的牺牲与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岁月静好。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党的教育、引领、呵护下成长的，我们从未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没有面对过生与死的考验，对于苦难和牺牲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而那些已经故去的仁人志士，他们是以血肉之躯，以不移的信念，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光明的红色大道，铸就了崭新而充满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初心宗旨，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加油、努力，再长征。

学史崇德

学党史，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为民造福的公德、严于律己的私德。纵观历史，从一大到十九大，无论逆境顺境，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率领党内党外人士持续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党的历史是一部在困境中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奋斗史，充满了惊涛骇浪、曲折起伏，也始终饱含着革命的浪漫和无畏。党的历史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抛家舍业、割舍亲情，甚至流血牺牲，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九死不悔。在风雨之中、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凝聚民心、扬帆起航，从未失去的，是对前途的清醒认知和方向的把握。

对一个已经过去的旧时代而言，他们是开天辟地的引领者，对于一个徐徐展开的新时代而言，他们是宏伟蓝图的擘画者。

中国共产党博大的政治胸怀和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使各民主党派开始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活动，建立和健全参政党机制，在新形势下开创了党派工作新局面。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变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坚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心同德的政治态度不变，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

作为民主党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盟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作为新时代的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对党忠诚、为民造福、严于律己，同样也是我必学、必修、必行的信念。

学史力行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学党史，要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干部，必须忠诚于党的组织，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必须忠诚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党关于统战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中共中央号召的坚决响应、中共中央要求的坚决照办、中共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干、中共中央部署的坚决落实。

余生正逢时，我们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提升思想高度，加强自我修养，以各行各业的先进楷模为榜样，继续关注民生，脚踏实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方不负党和国家给予的大好机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汲取历史经验，激励奋进力量，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干事热情，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百年。

近日，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参加了北京市政协组织观看的话剧《香山之夜》，并作诗《学党史 观话剧——〈香山之夜〉感赋》一首：“一番清泉曾涤耳，几度云烟幻江边。北平花落红仍在，金陵水流绿杳然。激荡风云今百载，重温党史仰前贤。峥嵘本色利名外，磊落初心天地前。”甚是欣赏创作者对于历史的捕捉，在方寸舞台上，呈现出决胜之夜，两位历史人物不同的心情和胸怀。隔着久远的时光来看，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所有的失败亦都是由来有因。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创新书院模式延续城市文脉

——和合学与温州学融合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在京召开“和合学与温州学融合发展研讨会”，20余名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化代表出席会议，围绕“校地合作”的深化、“书院模式”的创新、“城市文脉”的延续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积极参与到“校地合作”的实践探索中，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大量的实践探索。温州市龙湾区委、区政府重视城市文脉的延续与地方文化的保护，先后挖掘了永嘉场、永昌堡、永嘉学派、和合文化等兼具文化底蕴与龙湾特色的地方文化。两者决议开展深入密切的合作，携手推进“和合书院”的筹建与人大孔院温州分院的建设，共同探索书院模式与地方文化的结合。

中国和合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由《周易》研究、朱熹研究等诸多专题研究开始，逐步上升到对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的整体把握，统筹梳理了中国哲学的整体框架与源流脉络，进而构建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提出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认为，在宋明理学中，除了为人熟知的程朱、陆王两系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系，即温州的永嘉学派。依托和合书院这一公共文化空间，既可以挖掘和弘扬温州传统的文化与学术，使其为今人所用。温州市龙湾区政协主席张纯芳也表示，和合学的传播与发扬既能影响与滋润龙湾人的精神，也能为深化永嘉学派、温州历史、张璁文化等先贤名人的研究提供积极的思考。

“和合学既是一个哲学体系，也应该与当地的文化、教育、生活等融合在一起，使哲学社会科学走近生活、走近社会、走近人民。”张立文先生说，通过筹建和合书院，能够推动和合学与温州学的融合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既是文化的溯源，也是文化的传播；既是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的落实。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路上，和合学与温州学融合发展的相关成果也必将更加丰硕。